

劉大杰古典文學
論文選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劉大杰古典文學
論文選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刘大杰古典文学论文选集

责任编辑：陈仿彝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66,000 印张：8.125 印数：1——8,350

统一书号：10109·1683 定价：1.00元

目 次

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实主义问题·····	(1)
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现实主义的形成问题·····	(12)
列宁的两种文化说·····	(25)
关于现实主义问题·····	(28)
文学的主流及其他·····	(33)
中国文学史中的思想斗争问题·····	(48)
关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批评·····	(66)
古代的神话·····	(82)
关于《胡笳十八拍》·····	(87)
再谈《胡笳十八拍》·····	(102)
关于曹操的人道主义·····	(122)
论陈子昂的文学精神·····	(125)
杜甫的道路·····	(141)
柳宗元及其散文·····	(150)
李煜词话·····	(161)
黄庭坚的诗论·····	(163)
《儒林外史》与讽刺文学·····	(177)
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	(189)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艺术形象·····	(201)

薛宝钗的思想本质.....	(213)
探春的道路.....	(225)
晴雯的性格.....	(234)
尤三姐的悲剧.....	(247)
两个尤三姐.....	(253)
编后记.....	(255)

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实主义问题

最近，我读到苏联批评家雅·艾尔斯布克所写的《现实主义和所谓反现实主义》的论文（译文载《学习译丛》七月号），引起我很多的感想。我平日也常常考虑到这一问题，但一直搁在自己的脑子里，由于这篇论文的鼓动，我想联系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表示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近几年来，在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里，流行着一种非常普遍的见解：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大家这样说，大家这样写，成为一个非常有力量然而又是非常简单化的公式。把这一公式运用到我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文学史上，就会遇到种种困难，其结果是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不能真实地分析文学史的具体内容和各种文学流派以及他们的作品的不同的艺术特点。运用这一公式，所得到的不良后果，是多方面的。

一、“现实主义”的概念不明确。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究竟是指的什么？是指的在文学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最进步的创作方法呢？还是如雅·艾尔斯布克所指责的，

把现实主义的概念扩得很大，“跟真实性的概念等同起来”？因为概念既不明确，文学史家就无所适从，你这样用，他那样用，结果是把现实主义一般化了，看不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实主义作品的重要特征。

二、形成一种新的形式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历史，是反对任何一种形式主义的。我们如果承认这一公式：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那么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就只存在两种派别了，一派是先进的现实主义作家与作品，一派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反现实主义的作家与作品。于是文学史家就采用最简便的方法，好象破西瓜似的，把中国文学切成两半，这一半是现实主义，那一半是反现实主义。我看到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作者这样说：在这一时代里，某某作家到某某作家是现实主义作家，某某作家到某某作家是反现实主义作家。这种方法当然是简便极了，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在他们的文章里，没有明确现实主义的概念，在所谓现实主义的作家里，旁人看来，有些似乎不是现实主义的；在所谓反现实主义的作家里，也有些似乎不是反现实主义的。这一种新的形式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变形。

三、另外一种，是几乎都变成了现实主义的作家。解放初期，古典文学研究者对于古典文学的评价与肯定，大家都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所谓“现实主义”这顶帽子，看得很宝贵，从不轻易送给人。当时有资格戴上这顶帽子的，不过《诗经》、屈赋、汉乐府歌辞、杜诗、白诗、《水浒》等寥寥数种而已。连作家与作品一道合起来，还凑不满一张八人的桌

子。当时我自己也感到一种苦闷，觉得我们几千年的古典文学果真如此荒凉的话，那就真是害了无可救药的贫血症。二三年后，情形开始转变，现实主义的尺度放宽了，加进来的作家与作品也慢慢地多起来。最近两年，尺度放得更宽，凡是已经肯定的，正在进行肯定的、将来预备要肯定的作家和作品，都归到现实主义这一边来。因为文学史上只有两条路，不是现实主义，便是反现实主义，古典文学研究者和教师们，自然不能把要肯定的作家和作品，放到反现实主义的阵营里去。这样一来，便利用“古典现实主义”这个抽象名词，加以各种巧妙的解释，把“现实主义”这顶帽子随便戴在许多作家许多作品的头上。例如：汉赋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反映汉帝国的物质基础，是具有现实主义的内容的；阮籍的“咏怀诗”，侧面地讽刺了统治阶级，应当是现实主义的；陆机在某一首诗里，有两句诗反映了社会的面貌，他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成份；潘岳的“悼亡诗”写得很真实，有现实主义的基础；左思、鲍照的作品表示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和怀才不遇的情绪，当然是现实主义的；郭璞借游仙以寄慨，有现实主义的倾向；谢灵运虽出身贵族，他受了统治阶级的迫害，他的诗应该是现实主义的；谢朓的诗李白给他的评价很高，阴铿、何逊的作品，杜甫赞美过，应该归入现实主义的范围；庾信的某些诗句，表现了爱国思想，也是现实主义的；甚至有人说，就是宫体文学，也暴露了宫廷贵族的荒淫生活，不能说没有一点现实主义的倾向……这样写下去是写不完的。总之，仿佛变得无往而非现实主义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在无论内容、形式和艺术风格都非常丰富多彩的中

国文学历史现象内，要套进一个非彼即此的公式，必然要陷入一种困境。结果肯定的作家和作品愈多，现实主义也就愈多，弄到后来，几乎都变成了现实主义作家，所谓反现实主义的作家却看不见了。只好把一大群彼此艺术风格不同、创作方法不同，甚至互相对立的作家们，因为要肯定他，或者要在某一部分肯定他，又不能归到反现实主义的阵营里去，只好一视同仁地统统装进那一只现实主义的大木桶里。于是现实主义便变成了一顶“八寸三分帽子”，人人可戴。“要末，硬把许许多多重要的艺术现象咒骂一番而列入反现实主义之中；要末相反地，硬把各种极不相同的，相互间有原则性区别的作品，都称作是现实主义的作品”。雅·艾尔斯布克所指出的这种混乱现象，在目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里，难道不是一样地存在，一样地流行吗？

把几千年来复杂无比的文学现象，把各种各样不同的作家和作品，简单地理解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好象对于整个哲学史一样，理解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这种对文学现象的简单理解，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当然承认，在各种美学理论和文学观点里，都具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性，但如果对于文学作品不尊重它们的艺术特征，不好好地加以具体细密的分析，就简单地应用这一规律，结果是不能真实地说明问题，而且必然会陷入另一种形式主义。雅·艾尔斯布克说得好：“把哲学和美学理论中斗争的规律性，机械地搬到艺术中来，这是不可容许的。把现实主义同唯物主义，反现实主义同唯心主义加以这样的类比，就是抹杀艺术的特点。”这两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细心地体会。

现实主义是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最有力和最先进的”创作方法。我们说它是最有力最先进的创作方法，因为它在反映现实反映历史本质的真实方面，比起其他的创作方法来，能达到更大的深度和广度。但是我们不能说：只有现实主义才能反映现实、表现思想，其它的创作方法就一点不能反映现实，不能表现思想。不过，其它的创作方法，在反映现实、表现思想方面，比不上现实主义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所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最有力的最先进的。恩格斯说：“照我看来，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现实主义的典范的定义。我们必须明确现实主义的概念，尊重这一定义的精神原则，在文学史的研究上，才不至于把现实主义一般化简单化。

我现在想举出两个具体的例子来谈一谈。

第一个是屈原。

屈原，大家都说他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不错，在他的诗篇里，反映了他的爱国思想，对于当代的黑暗政治，表示了不满和反抗。但我们如果进一步来分析他的作品的艺术特点和创作方法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诗人，而是一个浪漫主义（积极浪漫主义）的诗人。最能代表屈原的艺术特点的作品，作者的个性表现得最鲜明的作品，是“九歌”（这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加工的），是《离骚》，是《天问》，是《哀郢》和《招魂》（这后一篇作品有人疑为宋玉所作，我以为是屈原所作）。在这些作品里，充满了热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美丽的象征、神秘的气氛，再加以神话传闻、

宗教风俗，上天下地，入水登山，冲破诗歌的格律，创造出参差不齐的新形式，在这些艺术基础上，表现出那种深厚的怀乡爱国之情、生离死别之感，和一个遭受迫害的苦闷的灵魂追求真理追求理想的失败以及最后归于毁灭的悲哀。由于这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风格，一个屈原所特有的艺术风格，这是浪漫主义诗歌的风格，而不是现实主义诗歌的风格。刘勰不能理解这一点，在《辨骚》一文里，说屈原的作品，有诡异、谲怪、狷狭、荒淫四事异于经典，不知道这正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特色。分析屈原的作品，不单是注意他表现了爱国思想和反映了现实，还要注意他是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来表现来反映的。如果不这样，就无法说明屈原的作品的精神实质。

其次，我要谈的是李白。

近几年来，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研究李白的文章。众口一辞，都说李白是现实主义作家。不错，在他的作品里，确实有些诗句（虽说不多），是反映了战乱和对黑暗现实表示了反抗的。但是，他的创作方法是如何的呢？我们只要对于李白的作品稍稍加以探索和分析，便会知道，李白正如屈原一样，不是现实主义的诗人，而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的诗人。他的代表作品，是《远别离》、《蜀道难》、《将进酒》、《日出入行》、《襄阳歌》、《梦游天姥吟留别》、《庐山谣》、《江上吟》、《战城南》、《关山月》和那些优秀的绝句（这是举例性质，并不是说他的代表作品只有这几篇）。李白之所以成为李白，李白诗歌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特殊风格，都在这些作品中体现出来。一千多年来，多少人批评他，赞美他，学习他，都是指的这些

作品中的李白，都是指的这些作品中艺术特点。他自己说的“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杜甫称赞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也只有在这些作品里，才真能体会出他那种拔山盖世、惊心动魄的气概，才真能体会出他那种纵横变幻、雄奇飘逸、天马行空、恹恹莫测的精神。在这些作品里，充满着无比的狂热的夸张，丰富的想象，豪迈的气魄，追求个性解放与灵魂自由的高度热情，在每一个读者的心弦上，发生了震撼与共鸣。他呼号，他嘲笑，他追求，他反抗。诗歌的语言，变化莫测而又俊逸清新，音律的迅速变动，形式的长短不一，使我们得到一种“在不整齐中求得整齐，在不和谐中求得和谐”的美感。李白的诗歌艺术，是概括了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一切特征，反映出他的思想内容的。他反权贵，反战争，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对于祖国山水的热爱与劳动人民的同情，都是通过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表现出来。研究李白的作品，如果不从这方面来探索来深入的话，那就真是“得者皮毛，失者风骨”了。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
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
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古风十九》

这首短诗，后面四句接触到安史之乱，李白的研究者重

视这首诗，认为它有思想性，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要问：这首诗的表现方法，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毫无疑问，是浪漫主义的。把李白这一类的诗篇同杜甫的“三吏”、“三别”排在一起，那区别是多么的鲜明。把李、杜都归之于现实主义的行列，这是真实的吗？

浪漫主义精神，是李白全部人生，全部艺术的主要动力，他那种“不屈己，不干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豪迈傲岸的性格，同他在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反抗一切传统与束缚，追求解放、追求独创性的浪漫精神是完全统一的。从这一点看来，李白是屈原真正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文学史上既然存在着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简单公式，象屈原，李白这样的作家，不说他是现实主义的作家，说他是什么样的作家呢？事实上，不是现实主义的大作家不单是“曾经有过”，在中国文学史上似乎还不少。屈原、李白以外，曹植、陶潜、王维、岑参、苏轼一类的作家们，我们是不能随便给他们带上一顶现实主义的帽子的。他们在艺术上有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文学史上都曾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对于他们的作品，除了采取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以外，用任何简单化的公式，都不能解决问题。

把浪漫主义同唯心主义加以类比，固然不对，把浪漫主义归于现实主义的范畴，作为现实主义的一种形式，难道又是正确的吗？浪漫主义在各国文学史上，都有它自己的光荣历史和光荣任务。在丹麦批评家勃兰德斯所写的六大本《十九世纪文学的主潮》里，他着重论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积极意义。他把他的著作称为六幕戏曲，自《法国的移民文学》到《青

年德意志》，一直贯穿了反对黑暗传统、追求解放、追求民主自由的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特别使我们不能忘记的，英国的拜伦，法国的雨果，德国的海涅，他们的光辉形象，他们的优秀艺术，他们那种勇猛的反抗战斗的精神，在他们自己的文学史上，都起了非常巨大的进步作用。他们都遭受过时代的迫害，都是一个个地遭受过流放的悲惨的命运。勃兰德斯这一著作，虽说是一部旧书，但在文学史的研究上，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我们的李白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在思想上反对传统思想的束缚，反对黑暗的现实。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一面是创作了许多不朽的诗篇，一面是以排山倒海、横扫千军的雄健笔力，把六朝到初唐以来的华靡柔弱的文风，打得落花流水，把那些繁琐、纤巧的形式主义，打得体无完肤。他的斗争的胜利，正说明了浪漫主义的胜利。他的斗争是浪漫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斗争，而不能理解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

再如晚明的公安派，在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运动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公安派也是浪漫主义的。这一次斗争，只能说是浪漫主义与拟古主义的斗争，同样不能理解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但不能说凡是要肯定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家；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斗争的历史，但不能说那些斗争历史，都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正因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先进的最有力量的创作方法，正因为现实主义作家与作品，在反映现实、反映生活的真实方面能达到更大的深度与广度，所以我们不能

把名实不符的创作方法，也看作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不能把在文学流派上有区别的作家与作品，统称为是现实主义的作家与作品。在这里，我们正是重视现实主义，而不是轻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虽说有它们自己的光荣历史和积极作用，但在创作方法上，是比不上现实主义的。正因为如此，屈原、李白的诗篇，在描写生活、反映现实、表现社会历史本质方面，就达不到杜甫诗歌的深度与广度。

杜甫才是现实主义的诗人。他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他有丰富的生活体验，他在贫穷、饥饿、流亡的生活中，受到了实际的政治教育与社会教育。他的思想感情逐步地同人民的思想感情拥抱融和在一起。在这样的基础上，丰富了他的诗歌内容，锻炼了他的诗歌技巧。他的创作方法，超越了他的先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兵车行》、《赴奉先咏怀》、《羌村》、《北征》、“三吏”、“三别”、《壮游》等优秀无比的诗篇里，取得了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而成为安史变乱前后唐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前人称杜甫为“诗史”，我觉得是要从现实主义这一意义上去理解的。

我在这里只提到杜甫，并不是说杜甫以外就再没有现实主义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戏曲、小说各方面，都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与作品。我上面只提到杜甫，那也正如在前面只提到屈原、李白一样，作为举例而已。

我们的文学遗产是十分丰富的，我们文学遗产中的优良传统也是多方面的。我们如果在文学史上只理解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那就会把文学史上各种创作流派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发展过程，看得过于简单。我希望

古典文学研究者（我自己也在内）对于中国文学史上的各种问题，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研究和分析，反对在过去曾经一度流行过的庸俗观点和简单化的公式。

最后我想借用雅·艾尔斯布克的几句话，作我这篇短文的结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古典遗产的接受，是在深刻批判地理解和创造性地吸取它优良的、最有力的各个方面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把现实主义和它的历史、现实主义在认识上和教育上的作用、现实主义的美学等等这些对于我们艺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问题作为专门讨论的对象，是极其必要的。”

一九五六年八月

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现实主义的形成问题

我在《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实主义问题》一文（见《文艺报》今年第十六号）中，主要是想说明：“我们如果在中国几千年来源远流长、丰富多采的文学史上，只理解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那就会把文学史上各种创作流派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发展过程，看得过于简单，并且是不符合实际的。”我同意雅·艾尔斯布克的看法，现实主义是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最先进的创作手法，而不能把现实主义同真实性的概念等同起来，甚至跟艺术性的概念等同起来。他反对苏联某些批评家把古典文学中的革命浪漫主义看作不过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形式，我也是同意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现实主义的作家和作品，也有浪漫主义（积极的或是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写文学史或是教授古典文学时，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把它们混同起来；如果彼此不分，就不能真实地说明他们不同的艺术特点。

我们如果承认现实主义是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最先进的创作方法，那末，现实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必有它